

东亚国际劳工移民的流动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向度

李昕蕾 任向荣*

The Mobility Features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East Asia

——on the analyzing dimens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Li Xinlei & Ren Xiangrong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ast Asian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ra-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free flowing commodities and capital, the cross-border labor force flows more freely than before, which leads to the rapid rising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East Asia, becoming a significant factor to influence the region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an increasing total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East Asia, the features of which mainly present regionalization, structuralization, hierarchy model and knowledge-orienta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relates closely with the three-level dynamic mechanism of region-nation-people. As a variable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has a far-reaching effort in the deepening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East Asian community.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日本雁行模式推动下,东亚地区^①内的贸易总量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由此带动了区域内国际移民劳工的流动。东亚国际移民劳工是指该地区内的劳工为了就业的需要从出生所在国或居住国迁往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从迁移时间看,既包括短期合同性移民劳工,又包括少数事实上的永久性国际移民劳工;从迁移者特征看,既包括无技术或半技术的移民劳工,又包括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东亚国际移民劳工的规模较小,且在输入国和地区范围上主要限于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此后随着韩国、中国台湾省、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开始

吸纳越来越多的邻国剩余劳动力,由此导致较大规模的劳动力在区域内流动,形成了东亚国际移民劳工群体。据世界银行2006年估测,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20多年间,东亚劳工移民总量增长了2~3倍,目前大约有600万,但分布并不均衡。东北亚相对于东南亚来说对劳工移民的依赖性要小一些,约为200万的移民劳工,而在东南亚约为300万到400万移民劳工。可见东亚区域内移民劳工流动已经达

*李昕蕾: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任向荣: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

①本文所使用的“东亚”概念,主要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东北亚和东南亚,涉及到的国家为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文莱。

到较高的水平,以至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国际移民体系的最新极”^①。本文以东亚国际劳工移民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其特征及其发展动力机制。

一、东亚国际劳工移民的流动特征

伴随着移民规模的不断增大,作为区域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东亚地区的劳工移民流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国家和地区两个层面的政治经济交流,并形成了东亚地区的独有特征和发展态势,从而构成全球化时代地区移民问题上的新视点。

(一)从流动趋向看,东亚国际劳工移民的地区化特点日益凸显,移民劳工作为一个地区性问题日益被关注

我们可以从外部力量制约和内部需求拉动两个层面来分析其流动呈现地区性的原因。从外部环境变化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由于中东石油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外国合同工人,所以中东曾一度成为东亚移民劳工的重要目的地,韩国、菲律宾、泰国和印尼都是主要输出国。1980年,泰国和菲律宾的海外合同工分别有97%和84%前往中东地区,只有3%和11%进入其他亚洲国家。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的下降,特别是1990~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发,使流向中东的劳工移民开始不断减少^②。

随着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东亚地区移民劳工的流动由向地区外流动转向地区内部流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泰国和菲律宾对外输出的劳工移民有89%和36%是前往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移民输入国和地区而言,地区内移民劳工的数量在新加坡劳动力市场占到20%以上,在马来西亚占12%以上,在中国香港占大约10%左右,在泰国占6%。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对移民劳工的依赖程度依然还比较低,只占到劳动力总量的1%~2%,但是增长速度迅速^③。

(二)从流动总量看,金融危机后东亚国际劳工移民流量日渐稳定,移民输入国对移民劳工由暂时依赖转为结构性依赖

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危机受害国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遣返外籍劳工,以促使本国新近失业的劳动力上岗。因此,东亚移民劳工市场在金融

危机期间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从地域来看,受到冲击较大的地区主要为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如印尼和泰国流失了大量来自日韩的移民技术人员,他们多在20世纪90年代后移民到东南亚,但在金融危机时被迫离开^④。另外,东南亚国家吸纳无技术或半技术的劳工移民数量因受危机的影响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如马来西亚在1997年后吸纳的移民劳工总量降低了近一半。

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其移民劳工市场不但未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在危机期间移民劳工数量还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特别是韩国,虽然危机期间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其他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但其移民劳工不仅没有被大批的遣返,而且还不断吸收外来移民劳工。日本作为东北亚的发达国家,一向因为其保守的移民政策在国际移民劳工问题上非常谨慎,但是在1990年到2003年期间,外国工人在日本劳动力市场所占份额几乎增长到过去的3倍,达到了70万,占日本劳动力总数的1.3%^⑤。

事实证明移民劳工的存在是国家经济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即使是金融危机也无法阻止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东亚区域内的资本流动的加速必然产生对移民劳工的结构性依赖。因此许多国家又不得不调整本国的移民劳工政策,开放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吸收更多的移民劳工。东亚国际移民劳工在2000年后经历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增长时期,如马来西亚到2003年就已赶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三)从内部流动循环看,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东亚地区劳工移民内部流动呈现次地区层次性

随着东亚经济雁行模式的发展和产业链逐步

①Prema-chandra Athukorala(2006).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in East Asia: trends, patterns and policy issues.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006: p18~39.

②Siow Yue CHIA. Labor Mobility and East Asian Integration.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6(1) p 349~367.

③⑤Prema-chandra Athukorala. (2006).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in East Asia: trends, patterns and policy issues.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006: p18~39.

④[澳大利亚]罗宾·艾尔代尔著,石松、于月芳、赵宇译:《亚太地区技术移民的增长》,《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第66~73页。

升级,地区内各国经济出现阶梯式的不均衡发展。由此东亚国际移民劳工的流向主要可分为东南亚与东北亚之间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两个迁移层次,具体而言:

第一迁移层次是从欠发达的东南亚国家向东北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迁移(除了中国、新加坡和文莱),表现为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国的移民劳工流向中国香港和台湾省、日本和韩国。移民以非技术或半技术移民劳工为主,尤其包括了女性劳工移民以及非正规移民。

第二迁移层次是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国际劳工迁移,表现为大批技术和非技术工人从印尼、菲律宾、越南和泰国流向经济较发达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移民输入国相比于移民输出国有着相对较高的工资收入和较低的失业率。该层次的移民流动最初起因于政府和雇主的劳工招募,但随着地区移民链的形成,迅速发展成一种自我持续的过程^①。

(四)从移民类型看,专业技术型人才在东亚移民劳工数量中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并成为推动整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东亚地区内部投资增长和贸易联系日益紧密,特别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专业技术型人才的重要性也在逐步增强,虽然高技能人才在东亚移民劳工总量中的比例还相对较少,但日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原因如下:

第一,“回流现象”的出现。自20世纪90年代始,大批在西方国家学习或工作过的东亚熟练技术人员开始返回原籍,且近年内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有两点:一方面是近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趋缓,就业压力增大,并且还存在着阻止外来人才从研发岗位升入管理岗位的“玻璃天花板”现象;另一方面是东亚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发展较快,这就为高级人才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同时政府制定和实行了很多激励措施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国,包括提供大量的研究基金、宽敞的住房、较好的工作环境等优越条件。

第二,东亚各国政府在诸多政策层面鼓励区域内或区域外的高技术劳工的输入。如新加坡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有意识地从国外引进专业技术人才,以提升本国的竞争力,并且为了留住人才,政府每年都批准约3万名外籍专业人士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②。又如,随着日韩对IT专业人员需求的增长,促

使来自菲律宾等国的技术人员能够较容易地获得进入这两个国家的短期工作签证,客观上导致了技术移民的突增^③。

第三,跨国公司对东亚地区投资的快速增长刺激了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近年来,在东亚地区出现了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的跨国公司和商业团体,它们在向工业化初期的国家或地区投资的时候,经常派出自己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以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即来自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的专业人员向东南亚各国流动。同时日韩企业普遍实行的“实习生政策”和互惠性培训也吸引一些东南亚的半技术或技术人员流向东北亚。

二、东亚国际劳工移民发展的动力机制

从经济学向度看,资本的运动支配着劳动力的运动:一是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国际市场及国际竞争的发展,要求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化以至全球化;二是资本的本性要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使人们之间交往速度的不断提高和空间距离的不断缩小,这为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创造了技术前提^④。但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劳动力的流动比商品和资本的流动要困难得多,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化远远落后于商品和资本的地区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机制使东亚国际劳工移民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区域内迅速发展?

(一)地区层面的动力

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成为劳工移民流动供需增长的原始经济动力,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腾飞带动了该地区对区域内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增大。

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德等国开始向日本转

^①吴前进:《东南亚地区的移民流动——以1990年之后的东南亚5国移民为例》,《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第32~40页。

^②新加坡:《丰厚待遇,延揽人才》,海外教育网,2004年6月4日。

<http://www.studyabroad.org.cn/xijiapo/jiuyeyimin/2007-7-4/XinJiaPo-FengHouDaiOu-YanLanRenCai.htm>

^③[澳]罗宾·艾尔代尔著,石松、于月芳、赵宇译:《亚太地区技术移民的增长》,《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第66~73页。

^④张宇、田方萌:《不对称的全球化——国际移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第79~83页。

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抓住了这一契机,开始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的轻纺工业。自70年代起,亚洲“四小龙”在日本“雁行模式”的带动下,及时承接钢铁、造船等重化工业以及汽车、家电等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自80年代中期后,亚洲“四小龙”在着重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同时也开始加速向东盟、中国大陆进行直接投资以转移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东亚地区的国际产业结构的梯度转换和升级促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日本和“四小龙”的跨国企业为中轴的直接投资网络。进入90年代后,东亚逐渐步入“后雁行模式”时期,日本产业升级减缓,首雁效应削弱,而东盟产业发展进程又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受阻,此时急需一种地区合作机制来整合本地区。此后以东盟为基础的“10+1”和“10+3”合作机制成立进一步推进了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并进一步推动东亚区域内贸易、投资链的发展。

新加坡学者谢陈秀瑜(Siow Yue Chia)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FDI)和国际移民劳工(ILM)存在内在联系^①。结合东亚各国(地区)情况具体而言,国际移民可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早期经济发展阶段,出现净劳动力输出和净资本输入,或者两者同时进行,如印尼、菲律宾和越南。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印尼是东亚地区最大的移民输出国,输出270万移民劳工,输出目的地主要为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省、新加坡和韩国,菲律宾居第二,共输出98.86万移民劳工,主要输往马来西亚、泰国、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省;越南居第三,输出40万人,主要输往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台湾省和日本^②。它们都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主要通过输出劳动力吸纳汇款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第二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FDI同ILM之间的内生性互动产生,最终减少了ILM的净输出同时提高了FDI的净输入。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工输出国也会成为劳工输入国,或者是处于一种过渡状态。这里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马来西亚和泰国。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马来西亚输入260万移民劳工,居东亚移民输入国输入量的首位;其次是泰国,输入140万。以泰国为例,其兼有输出和接受移民的双重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台湾省、韩国等地区和国家就业机会的增多,

泰国开始向外输出移民劳工。到2001年7月底,泰国移民劳工成为中国台湾岛内最大移民群体,大约有13万余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追求高速增长成为泰国国家发展政策的主要目标,每年的GDP增长率高达8%~9%。高速经济发展必然需要大量劳工,移民数量相应迅速上升。至2000年,进入泰国的移民人数已超过100万,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内吸收来自邻国移民最多的国家^③。

第三阶段,净FDI和净ILM的输入输出发生逆转性变化。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净FDI和净ILM的调整,国家(地区)逐渐变成同时为FDI和ILM的净输入国(地区),最终逐渐过渡到ILM的净输入国(地区)和FDI的净输入国(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的输入量基本在60万~90万之间;中国台湾省和香港在20万~40万之间。

以新加坡为例,迄今,在新加坡400万人口中,约100万为外籍人士,大部分的移民劳工来自菲律宾、印度和泰国。每年大约有3.3万移民劳工进入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宣布计划到2050年再增加200万^④以继续提高本国的竞争力。

须注意的是,各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能单独解释各种迁移模式。比如,马来西亚对外籍劳工的依赖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5倍,同时后两者对移民工人的依赖又比日本高很多。为什么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对移民劳工的结构性依赖较低呢?

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劳动力逐渐紧缩的迹象。尽管日本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但是日本仍然对移民劳工的输入采取非常严格的限制政策,而更倾向于采取快速的技术升级、机械化与自动化以及通过FDI转移生产地(即资本追逐劳动力)等办法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以避免移民劳工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但资本追逐劳动力的方法显然不适用于多数非贸易品行业,如服

① Siow Yue CHIA. Labor Mobility and East Asian Integration [J].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6(1) p. 349~367.

②④ Skeldon, Ronald. (2006). Recent Trends in Migratio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 15. No 2. p. 277~293.

③ Migration News Vol. 14 No. 1, January 2006.

URL: <http://migration.ucdavis.edu/mn/more>.

务、国内运输和建筑行业。即使在贸易品部门,这种选择主要是局限于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对于中小规模公司而言,通过输出资本来回应国内劳工市场的紧缩是不可行。所以从长期发展而言,日本必然会进一步调整国内政策,开放其移民劳工市场。

(二)国家层面的动力

在某些经济学者眼中,劳动力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本质上是同质的且可以互相替代的,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劳动力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和特殊商品,还是在一国主权范围内享有人权和公民权的社会主体,所以国际移民劳工的流动深受输入国和输出国政策的影响。

首先分析移民输入国向度。1979年经济学者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提出双重劳动市场理论^①,也被称为劳动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国内经济不断膨胀、对劳工的需求日盛一日,而另一方面本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具体而言,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经济体系会逐步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层次,即资本密集的主要部门和劳动力密集的次要部门,这种划分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层次性变化,进一步引起国内市场劳动力的相对性缺乏,即出现了一种“工作阶梯经济”现象,在这一阶梯中,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对劳动者需求增多,进而导致了工资上升,本国劳动者对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趋之若鹜,这部分市场已由现存的国内劳动力所填补上;而在阶梯的底端,那些报酬低的工作由招募移民劳工来完成。以马来西亚为例,由于其快速工业化,至2006年,移居到马来西亚的外国劳工移民已达260万,占其全国劳动力人口的20%。从而成为世界上外国劳工移民所占百分比最高的国家之一^②。

双重劳动市场理论的不完善之处就是忽视一国对高技术人才的引入,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专业技术型人才在东亚移民劳工数量中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如新加坡在国内政策层面通过不同的税收政策来鼓励高技术移民劳工的输入。2006年在其制造业中,雇佣一个高级技术移民劳工,雇主需要每个月只需向政府支付100新元的税,但是雇佣一个无技术的移民劳工,雇主需要每个月为他支付240新元的税,如果雇佣的无技术移民劳工数量超过雇用劳动力总数的40%的话,那么雇主每月为每个移民劳工支付的税要升到310新元^③。在东亚其他一些国家

和地区也都出台了类似政策,推动了东亚区域内技术人才的流动。

其次分析移民劳工输出国向度。当一国的经济发展缓慢不能提供充分的就业时,本国劳动力就会出现相对过剩,这种情况不利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所以很多政府对移民劳工的输出限制较少,甚至鼓励劳工出国以减轻国内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压力,同时赚取更多的外汇。

海外汇款是国际移民劳工带来的最直接收益,欠发达国家对汇款的依赖成为政府积极推进劳工输出的一个重要动因。世界银行估计,过去10年来全世界的汇款转移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95年的102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约2320亿美元。汇往发展中国家的数额在全球汇款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从1995年的57%(58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72%(1670亿美元)。在2004年收取汇款最多的20个国家中,中国以213亿美元占第二位,菲律宾以116亿美元占据第五位^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报告中说,2006年移民汇回原籍国的汇款高达2640亿美元,相当于所有国际援助总和的3倍,在一些国家,多达三分之一的家庭依靠侨汇而摆脱贫困。这个事实表明,移民使得发展中国家同样受益并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⑤。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过分依赖汇款流入,会导致其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随着汇款的流入,外汇的供给有可能导致汇率估价过高,不利于出口,并增加进口产品同本地产品之间的竞争。同时若没有适当的经济环境,国际移民就会把产生移

①周聿峨、阮征宇:《当代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7页。

②Skeldon, Ronald. (2006). Recent Trends in Migratio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 15. No 2. pp277~293.

③Southeast Asia Migration News, Vol. 13 No. 2, April 2006. URL: www.mom.gov.sg/Forms/WorkPermit/ForBusinessEmployers/ForeignWorkerLevy.

④联合国大会:《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国际迁移与发展》,第六十届会议,议程项目54。http://www.un.org/chinese/focus/migration/5.htm.

⑤潘基文:《移民为经济发展带来机遇》,http://www.un.org/chinese/focus/migration/sg.htm, 2007年7月10日。

徙人口的地区变为“幼儿园和养老院”,而非有活力的经济体。

(三)个人层面的动力。

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工资上的差距是移民产生的根源,即理性个人想要获取更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和对出国后收入提高的预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国际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模式及其带来的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差异成为拉动地区国际劳工移民供需两旺的内在动力,并且这些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扩大。

除了理性个人的愿望驱动之外,劳工移民是否能出国很大程度取决于迁移费用。从非常贫困的家庭中出来的劳动力移民的可能性很小,但东亚地区独特的移民链的形成解决了这一问题。移民链是指来自某一地区的移民劳工一旦在国外有了立足点,就会为新的劳工移民提供移民资讯和帮助,特别是迁徙过程中贫困因素的瓶颈可以通过先前的海外亲属的汇款得到缓解。移民链使得移民过程较为安全、稳妥和连续,在增进新移民对移居国的了解,适应新环境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移民链的形成历史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东南亚移民劳工的规模将近是东北亚的两倍。历史上东南亚是来自中国、印度和中东移民潮的目的地,这种移民潮给东南亚地区的人口模式、社会及政治层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迁移传统使相邻的国家有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系,且这些区域往往在语言、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习俗上具有相近或相似的特点,区域经济的崛起更使移民劳工在地区内流动成为首选。虽然东北亚地区在历史上同样经历了从日本到中国大陆、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省,从中国大陆到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台湾省的移民潮,但是这种移民潮在二战期间受到中断,战后的政治格局也限制了劳工移民的发展。

结 语

从地区层面看,东亚的产业转移带来的资本与

技术的流动使东亚地区不再仅仅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边缘附属地区,而是有了自身的内部经济系统。东亚地区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有了其内在的经济支持和物质依托。东亚国际劳工移民正在成为东亚国家高速增长和政治社会结构转换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不仅涉及到当事国的利益,而且也成为影响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等领域的一个重要变量。移民流基本上受需求驱动,潜在的决定因素是结构性的而非短期性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7年第一届移徙与发展问题全球论坛上呼吁,国际社会应处理好本世纪最大的挑战——不断增长的移民问题,把移民潮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机遇^①。

不能忽视的是,东亚大部分国家不仅缺乏一个长远性、确定性的移民劳工规划政策,而且各国政府的移民劳工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日本、韩国一直尚未制定明确劳工移民政策,有时通过临时性的实习生计划允许劳工从不正规的渠道进入国内市场,泰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姑息不受控制的移民以非法途径秘密入境。政策的差异性和不健全性导致各国在移民劳工问题上合作更加困难,使暂时的非法移民转向长期化,从而给劳工输出和输入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2007年东盟峰会上,10位东盟国家的领导人签署了《东盟关于保护和促进移民劳工权利的宣言》,各国一致同意尽快制定有关的章程,来保证移民劳工享有较好的和较安全的工作环境,并且制定地区内移民劳工的最低收入标准^②。宣言的签署可以说是东亚各国在劳工移民政策合作方面跨出的重要一步,向人们展现了通过地区合作来进一步规范移民劳工流动的前景。

①潘基文:《移民为经济发展带来机遇》,http://www.un.org/chinese/focus/migration/sg.htm,2007年7月10日。

②Migration News Vol. 14 No. 1, January 2007.http://migration.ucdavis.edu/mn/more.